

当代德育理论译丛

檀传宝 主编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美] 内尔·诺丁斯 著

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

侯晶晶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檀传宝 主编

[美] 内尔·诺丁斯 著

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

SHI YU JIATING : GUANHUAI YU SHEHUI ZHENGCE

侯晶晶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 周益群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 / (美) 诺丁斯著；侯晶
晶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9

(当代德育理论译丛 / 檀传宝主编)

书名原文：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ISBN 7-5041-3425-2

I. 始... II. ①诺...②侯... III. 家庭社会学
IV.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1000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1842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21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331 千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印 数 1-3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作者简介



内尔·诺丁斯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美国教育哲学协会和约翰·杜威研究协会前任主席。她的主要著作包括：《关心：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观点》(1984)、《女性与罪恶》(1989)、《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1992)、《培养智慧的信仰和反叛》(1993)、《教育哲学》(1995)、《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2002)、《培养道德的人：以关怀伦理替代人格教育》(2002)，以及最新出版的《幸福与教育》(2003)，等等。同时她也是170篇文章的作者。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内容涉猎从关怀伦理到数学分析等广泛问题，在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并具有国际影响。

诺丁斯曾经在美国公立学校任职15年，先后从事教学、行政和课程开发工作。她曾经担任新泽西州中学数学教研部主任、芝加哥大学杜威实验学校 and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在斯坦福大学，她三次获得优秀教学奖。

诺丁斯是美国国家教育学会会员，并从2001年开始担任该学会主席。她拥有两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和许多荣誉团体的会员资格。她还是哈佛大学杰出妇女教育贡献奖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总 序

多元文化时代中国德育的 必然选择

(一)

尽管一些人对“多元化”抱有过分谨慎的态度，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德育是一个最具文化特性的事业，无论是德育目标、内容的确定，还是德育过程与方法的选择，全部德育活动都是一种无法脱离文化的价值存在。

多元文化时代给德育带来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德育的目标和内容方面，多元价值的相遇、对话，甚至是冲突，都有利于当代德育更认真、更仔细地看待价值文化的相对与共识；在德育的过程安排、方法选择等方面，由于价值本身具有的相对性在多元文化时代的空前凸现，所有人都会发现：没有学习者的主体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德育，古代社会所笃信的强制灌输的德育模式将彻底地无以为继。就像互联网使得信息垄断变得日益困难一样，多元化时代的来临最有价值的意味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与科学时代的来临——其中当然也

包括德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或者价值多元会使得当代人前所未有地在价值生活上无所适从。而这一时代特征将使所有社会和个人都“被迫”关注德育，并认可它的重要性，关切其实效的提高。从德育的立场出发也许我们可以说，托多元文化之福，一个从真正意义上关心德育的时代已经来临。

当然，多元文化时代并不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单方面的福利。“双刃剑”之所以成为我们经常引用的一个隐喻，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价值多元的另外一个层面——危险性或者挑战性的层面。

与德育密切相关的危险性、挑战性首先表现在：由于达至共识是如此之难，价值多元最有可能导致的危险就是虚假的价值宽容或者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结果往往是价值虚无主义。而当什么都是对的之时，德育将在实际上被取消。最近二十多年时间中，西方社会之所以普遍出现德育向传统回归的趋向（比如，美国的品德教育运动正在蓬勃展开，英国已经将公民教育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就是因为学校德育已经走向了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或者已经被错误的“民主”、“自由”等概念所误导。当许多人宣称道德、价值的选择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教育能做的就只能是帮助学生“澄清”他们已有价值观的时候，德育其实已经不再存在。我们相信，如果不对西方一些国家所经历的曲折保持理性、冷静的观察，像中国这样正在向西方学习、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就极有可能重蹈他们的某些覆辙。

此外，由于多元化与“全球化”的密切关联，多元文化时代又是一个极容易被操纵、被引诱的时代。当发展中国家或者弱势文化群体宽容、膜拜某些价值观（常常属于强势文化）的时候，多元化恰恰可能变成一个文化强权、价值灌输的工具。以美国当下风头正盛的品德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运动为例，当一些学者热衷于找寻价值共识或者底线，以便进行正面、直接的品德教育的时候，一些学者已经公开质疑：“谁”的共识、“谁”的底线？——原来他们发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社区通过家长投票之类方法所确定的所谓价值共识依然不过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白人的“主流”价值观，少数族裔的价值观已经被无情、“合法”地边缘化了。这种“多数人的专制”将会继续下去，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的话。

多元文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德育的必然选择只能是：积极拥抱多

元文化时代而不是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阶段。因此，保持中国文化与德育的主体性，批判性评价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向其他文化贡献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教育智慧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批判、吸收、创造的前提都是——打开窗户看世界。我们特别需要认真比较、分析、取舍外部世界的相关思想与信息，以便以比较开阔的胸怀和视野真正独立自主地去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德育问题。因此，作为一套力图全面介绍当代国外德育理论，尤其是发达国家中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有较高研究与应用价值的德育理论著作的翻译作品系列，“当代德育理论译丛”的正式面世，应当说是正当其时的。

(二)

基于多元文化时代德育使命的分析，我们对于“当代德育理论译丛”的意义或者严肃性有充分的认识。

为了保证品质，本“译丛”将遵循从严和开放两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所谓“从严”，首先是指入选的著作一定是经过本领域专家认真甄别并确认为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是指我们将在翻译、出版的各个环节尽最大努力保证每一本译著的质量。而“开放”的意思是：本“译丛”不仅在国别上向美、英以外的国家开放，争取更广泛的国际视野，而且意味着一个适当开放但仍然严谨的“德育”概念——对作品的选择将以道德教育为主，但是适当延伸到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品德心理研究等相关领域。

我们深信，“当代德育理论译丛”出版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社会效益）将是巨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有重视德育的优良文化传统，所以中国德育一方面现实问题很多，另外一方面深切关心的人也很多。从政府到民间，许多有识之士都非常关心德育实效的提高，都在积极找寻有借鉴价值的“它山之石”。在学术层面，中国本土德育理论创新更是急需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德育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地和认真地对话，并获得有益的启示。所以更多可供学习、借鉴的国外德育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无疑将会对中国社会文明与学校德育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作为主编，本人要在这里真诚地向对本“译丛”出版作出重要贡献的相关人士致敬和致谢。他们是——

在筛选和确定第一批备选书目方面给予热心帮助的 Alan Lockwood 教授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Nel Noddings 教授 (Stanford University)、Elliot Turiel 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Larry Nucci 教授 (University of Illinois-Chicago)、Marvin Berkowitz 教授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James S. Leming 教授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Merry Merryfield 教授 (Ohio State University)、Fred Newmann 教授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等所有美国同行, 和为本“译丛”提供同样帮助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 Graham Haydon 博士、Hugh Starkey 博士, 以及其他国外和国内的专家。

踊跃承担“译丛”的翻译, 并且认真负责地完成各自任务的译者及进行认真审校, 确保翻译质量的各位同仁。

热心支持本“译丛”出版的教育科学出版社领导和为“译丛”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的编辑朋友。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也许本“译丛”出版的意义言说和由衷感谢的话实际上都没有特别的必要。最后我们所能说的也许只能是: 衷心希望通过不懈努力, 本“译丛”能够成为多元文化时代中国德育学术研究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檀传宝

July 26, 2006

Room 202, 15 Woburn Square

IOE, London

致 谢

多年来，许多学者、教师、学生和同事给予我思想的启迪，他们对于本书的内容与形式其实都有所贡献。虽然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诚挚地感谢他们每一个人。

还有几位是我要特别感谢的。拉里·布兰姆（Larry Blum）阅读了大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爱娃·费德·基塔（Eva Feder Kittay）提供了几处例证，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关于权利和需要所作的评论对我有所启发，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就关怀是美德还是关系的问题与我探讨，对我也很有裨益。此外，纽约女哲学家协会的同人对“需要”一章的初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育哲学学会为斯洛特和我进行探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一位轶名的评论者怀着“敬意和愤怒”点评了几章的初稿，保尔·斯默耶斯（Paul Smeyers）提示我关怀具有广阔的适用领域。我的同事斯蒂夫·桑恩顿（Steve Thornton）与我在学校的小径上散步时，所作出的深度探讨。

在此，衷心感谢基娜·李（Gina Lee）和罗基·舒瓦茨（Rocky Schwarz）帮助我做电脑文字处理工作。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深爱的丈夫杰姆（Jim）、我们的孩子和孙儿们，他们让我能有时间在那（凌乱的）书房里静心工作。

我与劳米·斯奈德（Naomi Schneider）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合作也非常愉快。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信任与支持。

目 录

致谢

| 引论 始于家庭 (1)

第一编 关怀理论

| 1 关怀 (11)
| 2 伤害与关怀 (33)
| 3 需要 (55)
| 4 探析自由主义的不完备性 (71)
| 5 关系性的自我 (95)

第二编 自我与他我

编首语	(123)
6 身体	(129)
7 处所·家·物品	(153)
8 关爱	(181)
9 培养为人接受的能力	(195)
10 学会关怀	(213)

第三编 走向关怀社会

编首语	(233)
11 发展社会政策	(237)
12 家与无家可归	(257)
13 偏异	(275)
14 教育的核心	(285)
结语	(303)
参考文献	(305)
术语英汉对照表	(319)
译者后记	(321)

引 论 始于家庭

近 20 年来，许多著作论述了关怀（caring）是道德生活的一种取向以及关怀理论对于伦理学的贡献。^①女性主义学者（包括两性学者）一直大力倡导关怀理论。他们将关怀的核心思想归结为女性的关系性体验，认为男性和女性如果分享关怀的酸甜苦辣，便都可以丰富人生。

笔者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于悠久的哲学传统。自柏拉图以降，哲学界一直遵循的惯例是先描述一个理想国或最佳国家，然后考察家与家庭对于建构这种国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先描述最佳家庭，然后延伸到考察大社会，又将有何所得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效地回应关怀理论经常受到的一种批评：关怀理论是“家庭”层面的一种精致理论，但是对社会层面上的政策制定并无裨益。

关怀作为一种道德取向是不限于一个领域或一个性别的。但是，采取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否认关怀可能源于某一个领域——源于我们逐渐称之为“家庭”的小环境或者父母之爱。倘若如此——即我们的关怀意识和被关怀意识起源于家庭——那么，认真考察这一起源，并对其进行哲学研究，便是合情合理的。^②然后，我们就可以探讨关怀理论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意义以及在个人生活中关怀素养的发展。我认为，要充分讨论道德生活和社会政策，学校和家庭是核心。始于家庭，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限于家庭。理论就像孩子一样，会成长发展，走入公共世界。

本书开篇即描述关怀理论。前三章对关怀进行现象学的分析，阐明关怀理论可能如何防止某些伤害，满足某些需要，这一点已证实是其他理论视角难以企及的。虽然关怀伦理对男性和女性均可产生指导作用，但是我集中研究关怀与女性体验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自然关怀”的发生早于并优先于“伦理关怀”。“自然关怀”是一种无需伦理努力激发的关怀形式，虽然回应需要也要求付出相当多的身心能量。我们召唤伦理关怀是为了确立或重建自然关怀。由于每一次关怀经历中都至少涉及两个方面，而且双方都积极促成这种关怀关系，所以即使是最有用的理论描述也可能会因情境而异、因人而异。然而，由此衍生的理论可用于指导社会政策的制定。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需要另一种社会理论或政治理论呢？有此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们下一步的论证就转向对当代重要理论的讨论。这些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变体对社会思想的贡献极大。我绝对无意将这些理论全盘否定。我只是试图准确地分析这些理论存在哪些需要改进之处，并且阐明关怀理论可以弥补哪些具体的缺陷。

该讨论的一个要点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比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这方面做了特别有益的工作。他提出一个睿智的建议，即我们应该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并非人类所有的重要价值都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中同时实现。^③伯林认为，为了实现某种价值，我们必须牺牲少许另一种价值，我们至少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我认为，尽管经典自由主义担心家长式作风，但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必须时常干预成人的生活，以防止他们自我伤害。

除了杜威及近些时候的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之外，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对教育的论述少得惊人。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公民们特别关注学校及学校教育中的问题。但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们至少在他们所构建的理论中对学校教育问题保持沉默。他们偶尔开口，其评论又多少有些天真——似乎儿童的养育和教育相对于社会政策来说处于次要的边缘地位。^④我同意杜威的观点，教育不仅仅是社会政策的一个范畴，它必须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的核心。

正义与关怀之间的争论也必须加以论述。与此争论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在意”的问题。（在意那些在社会地位、文化、空间或时间上——即处于未来的——与我们有一定距离的人们）。^⑤在意为正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动机，生成了正义的颇多内涵。讨论“在意”与“关怀”（直接的、面对面的关怀）之间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当我们直接关怀他人有心有余而力不足时——也就是说，我们真诚地在意他人的幸福——我们就诉诸正义原则。这些原则类似于我们身临其境时会采取的行动（或使他人采取的行动）。厘清在意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之后，我描述了关怀与正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社会政策的启示。

对当前理论进行分析，结果会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描述自我。这种描述既不应从一位成熟的、理性的选择者开始，也不应从被抽象描述的特定群体的成员着手。反之，我们需要详尽的关系性的描述。对关系性的自我进行仔细考察可以揭示相遇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撒哈拉沙漠中游牧部落儿童的相遇经历与美国城郊儿童的大相迥异，但是纽约或芝加哥贫民区儿童的相遇经历也一定不同于纽约州斯卡斯戴尔镇或伊利诺伊州的温莱特卡地区的儿童。将这些各不相同的自我描述成现代自我、后现代自我、西方自我、世界自我或任何其他集体性的术语，几乎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在称为“自我”的关系中讨论相遇，关于相遇的性质以及谁控制相遇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社会对它的成员的相遇经历应该施加多少控制？从另一个更为存在主义的层面上来说，成长的自我对它自己的相遇能控制多少？特别是对其反思性的相遇——即它与思维对象、记忆、情感反应及对过去和将来的图景——能控制多少？

本书的前五章为第二编的展开提供了背景材料。我在第一编中详细描述了关怀这种道德取向，这对第二编的写作起到了导向作用。我讨论了为何需要关怀，关怀可以取得何种成就。在第二编中，我分析了最佳家庭如

何培养好人。

我很清楚，“好人”及“最佳家庭”这样的表述会引起许多读者的警觉。我无意就做好人意味着什么给出一个最终的界定，也无意描绘一幅理想家庭的愿景，而是要选择一种我反复称之为“最佳”的理想。在一种内心对话中，我会问自己，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是单一不变的。我还会自问：理想家庭是如何运作的？比如，我会问自己，所有理想家庭中的成员是否能学到一种共同的东西？我的回答是，撇开其他不谈，他们至少能学到一种道德实践的指导思想：永远不要施加不必要的痛苦。这一指导思想在具体运用中会呈现出多样性，其核心问题是对“不必要”这个词的理解。我们还会看到理想家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每一个理想家庭中，都有一个关爱者。每当别的家庭成员需要他或她时，都会得到一个令人放心的回答“我在这里”。

很清楚，在有些案例中，出于某些目的，我会推崇一种理想。比如，在讨论理想家庭的道德合理性时，我喜欢这样的最佳家庭：它们指出家人言行存在的逻辑错误，但又不会谴责他们，使其抬不起头。这种做法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鼓励我们彼此关怀；自由主义会将它称为宽容或尊重。但是，关怀理论认识到，即使我们无法总是给予别人尊重，我们仍可以继续关怀他们。在某些案例中，我给出了我推崇某种理想做法的理由，让读者来评判我论据的力度。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我认为，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做法相对而言更具有工具合理性。

当我们从家庭的视角探索社会政策的理论建构时，我们要探讨什么样的相遇才能塑造成成长的自我，并且促进成熟自我的继续发展。婴儿有机体与身体相遇，这些身体有的生气勃勃、有的缺乏活力；它开始感受到初级自我存在于某个处所；随着其自我的发展，它开始意识到和他我的相遇。在上述三种主要的相遇中，逐渐呈现出的自我意识到做好人意味着什么。

我在思考最佳家庭所特有的关怀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伸到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我认为，最佳家庭很少使用强制手段，偶尔进行强制，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家庭成员自我伤害，而不仅仅是阻止其伤害他人。同样，最佳家庭很少会产生消极应得观（即罪有应得）。

理想家庭所培养出来的人的特征和行为被抽象为哲学的原则和范式，虽然合理的做法是将道德原则解释为更接近于描述性的，而不是近乎规范性的。像杜威和亚里士多德这样差别很大的哲学家都指出：如果一个人在

与他我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中不曾体验过或践行过道德规范，那么道德规范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无需承担责任（虽然我们必须推究他们要负多少责任），也不是说任何真正的家庭都能满足理想家庭的标准，从而保证培养出好人，而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做得比目前要好。

第二编将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如果一个政策或规定无法使当事人对其掌管或控制的人作出积极的回应，那么这一政策或规定就不应被制定。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别人明示的需要都必须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有求必应，虽然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特定的情况、条件、优点和需要，最大限度地予以积极的回应。这一指导思想的关键是规则与政策不应该使得负责人无法灵活地做出有益于他人利益的不同反应。

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想法运用到社会政策中去呢？在建构完备的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应得到重视。人们普遍认为，“正义思维”产生于公共领域，在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身上发展得最为充分。关怀取向产生于家庭，在那些一直负责照顾他人的人们身上似乎发展得最为充分（即使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始于家庭的社会理论或政治理论所包含的要素不同于始于更广阔的共同体的同类理论。本书的中间部分试图明确这些要素。

如果我们从公共生活中能力齐备的、理性的成人着手来构建理论，就会很容易认为自由与平等是至高无上的善。毫无疑问，自由与平等不可或缺，但是如果我们从家庭着手，我们会看到：“成人”更为重要。好的父母希望孩子作为完整的人能够取得某种形式的成功，或曰能够“成人”。如果我们将思维向外发散（暂且这样说），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更大的社群在促成人们成人的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回避与“积极”自由观相关的滥用权力问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企图（积极自由观认为：一个人有权成为他或她应该成为的人）。我认为，对家长式作风的担心和对积极自由观其他方面的忧惧经常会使我们束手束脚、动弹不得。

如果在家庭里的所学所悟与我所勾画的关怀理论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考虑最佳家庭所特有的反应和态度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这就是第三编的核心内容。关怀无法单独发挥作用。确实，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关怀即使在家庭中也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因为关怀在家庭中的种种体现至少受到社会中的正义进步的得力影响。但